

海外活動類

99 年人文教育革新中綱計畫  
子計畫三 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

【補助類型-海外專題研究】

【計畫名稱】

期末成果報告

指導暨補助單位：教育部

指導單位：教育部顧問室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畫辦公室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黃城教授

執行日期：2010/1/1~2010/6/30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1 日

<p>計畫名稱</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華裔離群對中國認識的一種途徑</b></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b>以新加坡東亞研究所與黃朝翰為例</b></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i>A Diasporic Approach to China: The Case of the Singaporean East Asian Institute and Director John Wong</i></p>
<p>計畫摘要</p>	<p>新加坡的中國研究有別於其他地區的中國研究，有其特殊的建構脈絡及歷史軌跡。事實上，在整個中國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執政者的意志及主持中國研究者形塑了整個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特色。影響所及，政府的政策乃至於學術界的研究走向均看得見東亞所的痕跡。本文從離散理論的視角深入分析長期擔任新加坡東亞所關鍵角色-黃朝翰學術所長的著述論述與東亞所研究員的學術產出，作為呈現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一種途徑。黃朝翰來自香港，曾身處歐美知識界，其缺乏新加坡本土性的特色，正是領導者所意欲的身分策略。而東亞所挑選的研究員，在身分上也大多具備如此特性，其知識產出提供了新加坡政府與西方學界關於中國的情報。顯見華裔離群學者處在中、西之間兩邊力量的拉扯下，的確會呈現出與單純來自中方或西方學者的不同研究視角，研究者身分的差異對於中國知識的詮釋存在分殊性，這也有助於理解方興未艾的中國研究之研究者處在不同位置與身分對「中國」理解的差異。</p> <p>The China Studies in Singapore is distinct; it has evolved from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s. Both political and academic leader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shaping China studies.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is particularly critical to China Studies in Singapore. This has to do with its function as well as its leadership.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AI and its leadership from a diasporic theory point of view. Specifically, Professor John Wong, together with those colleagues he has recruited and advised, represented the Singaporean style of China studies. John Wong, who came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received his training in the West. His, as well as his colleagues', lack of local connection fits perfectly well into Singapore's strategic choices which are to attend closely to China's growth, avoid ethnic sensibilities among Southeast Asian neighbors, and remain its Western outlook. The diasporic characteristics is present both in the design of the institute and the composition of its staff. By tracing the three stages</p>

## 目 次

一、計畫名稱.....	6
二、計畫目標.....	6
三、執行情形.....	6
四、經費運用情形.....	7
五、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7
六、結論與建議.....	8
七、附錄.....	22

## 一、計畫名稱

### 華裔離群對中國認識的一種途徑

#### 以新加坡東亞研究所與黃朝翰為例

## 二、計畫目標

中國向來是社會科學家適用既存社會科學理論的地方。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所提供的具體的或潛在經濟機會，使更多的人必須從中國人的角度了解中國人，才能有助於他們在洽談商機、管理工人、設計產品的時候拿捏得體。中國人前往海外成為勞工、專家、富豪、學生、亡命人、配偶、罪犯，逐步瓦解人們對中國的單一刻板印象，從而有了大中國區域的說法，力求能將滿溢出大陸的中國人，再放回一塊看似客觀的地域空間中去。大陸的研究者雖然對西方有所反彈，然而中國大陸對西方資本、管理、產品、技術、人員的接受，早就不容許有單一的中國觀點了，則抗拒西潮的氣氛失去著力點。

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往來，和世界各地對中國的研究，就在這種相互激盪之下，彼此發生作用，一方面，既有人想鞏固中國作為一個靜滯的客觀對象，另一方面，又有人抵制這種努力。其結果，全球化對世界各國自我認同的衝激，可以一定程度地在中國研究上反映出來。全球化潮流下中國認同的呈現，說明了全球化對中國研究者的衝激，對中國研究的影響想必深刻，也就對中國人如何認識自己，產生某些效果。因此本研究的具體研究目標如下：

- (1) 追求我國「中國學」知識卓越與特色的研究成果
- (2) 重現新加坡「中國學」知識社群之多元問題意識
- (3) 反思台灣在全球華人中的身份論述與策略

## 三、執行情形

本人在新加坡期間共進行了八場的田野調查訪談，同時也深入到本研究所挑選的個案：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不僅蒐集到許多關於東亞所的出版刊物，同時也與本研究核心的研究人物：黃朝翰進行四場的訪談。所有訪談與資料蒐集均已順利達成，符合預計目標的預期。

## 四、經費運用情形

經費主要運用在機票與生活費上，其中生活費佔了總經費的比例為91.1%，又以住宿與交通為最大開支。在新加坡田野調查時間達115日，所有經費均已運用在機票費與生活費上，執行率達100%。

## 五、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 (一) 執行成果

#### 1. 完成預期訪談

本研究必須親赴新加坡的重大理由便是所有研究分析的個體均在新加坡，同時許多的資料國內館藏付之闕如，直接身赴新加坡便能去除這些障礙，同時更能獲得第一手的資料。更重要的是這些訪談人物都在新加坡，在此訪談能讓他們進入其自身語境，不會受到干擾，對於呈現研究工作的結果有直接且正面的幫助。

#### 2. 帶回珍貴資料

新加坡東亞所的許多資料都屬於內部流通性質，因此若非親赴東亞所難已獲得這方面的資料，也正因為我已經獲得新加坡東亞所的要求，因此他們同意我可以複印若干內部的資料，對於本研究的內容補強有極大的幫助。

### (二) 檢討

#### 1. 與受訪者的互動不足

本研究由於和若干訪談者過去並未有交談的經驗，因此在訪談過程中，可能無法問到真正想要的資料，同時和受訪者互動不足的結果便是訪談有時未能可以深入進入問題的核心。

#### 2. 訪談時間的掌握

由於受訪者未必瞭解研究的宗旨，因此可能會暢所欲言。在此情況下應該要提醒受訪者，而非讓受訪者自由發揮，因此這方面的經驗便顯得很重要。

## 六、結論與建議

### (一)、華裔離群的當代課題——進出中國

新加坡作為一個海外華人的寄居地，其對中國的存有若干想望無庸置疑，只是程度多寡與作法差異各有巧妙不同。只是這種想望能否毫無保留的呈現在他們的知識產出中，這就是華裔離群學者必須要做的考量。他們受過西方專業的學術訓練，他們有著比受傳統中國訓練的學者多了學術工具，但也比西方出身的學者多了對中國訊息的敏銳度，「面對中國」是個學術上的習題，也是情感上的難題。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的黃朝翰乃至於其中的學者，其共同的特色為出身中國，受西方學術訓練、歐美名校博士並選擇以「中國」作為研究主軸，如同後殖民理論中的論述：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處的社會文化結構中，但是他們對其他時空依然殘存著集體的記憶，在想像中創造出自己隸屬的地方和精神的歸宿，故而有如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的概念，新加坡的華人是當地的主流階層，但是新加坡政府不能夠讓組成份子以華人為主的原因而使得新加坡變成了第三中國。<sup>1</sup>於是從新加坡政府乃至於研究單位，他們的政策取向，或是研究方向都不能太過「中國」，「中國」只能是研究上的課題與工具。

### (二)、胸懷東方的西方研究途徑

如本研究第一章所述，新加坡的歷史與地理環境背景受到東南亞周邊回教國家的環伺，其對中國的態度會受到周邊國家如馬來西亞或印尼的影響，尤其是馬來西亞在中共建政時明確地表明反共的立場，新加坡政府甫脫離馬來亞聯邦自然不可能櫻其鋒地投入中國懷抱，但新加坡知道做為東南亞的國家，中國肯定是其重要的機會。於是他們在政策上並不與中國為敵，也不在表面上交好，他們等待周邊國家及大環境的改變來取得和中國交往及合作的機會。

新加坡政府、新加坡國大東亞所乃至於黃朝翰都是新加坡在面對中國時的重要單位，他們大多和西方能無障礙的接軌，專業的學術訓練讓他們有了將「中國」視為研究客體的重要工具，面對東方時他們又具有離散理論式的情懷——一種跨界流動的關係；面對西方時卻又能不卑不亢地以學術專業來呈現研究中國的結果。

---

<sup>1</sup> 即使在中國逐漸崛起的今天，李光耀還是認為必須要以「英文」當作是新加坡最重要的語言，其重要的理由便是不能讓世界認為新加坡是中國的「海外基地」。

於是乎他們的身份或所處的位置變成一種策略性的運用成為或中西方力量拉扯時的工具。

### (三)、有利的文本詮釋位置

新加坡的華裔離群者有別於其他地區的華裔學者而言，他們有著更有利的詮釋權。身處在西方世界的學者有時因為所處環境而必須做出某些定向的詮釋，但身處新加坡的華裔離群者，能夠巧妙地轉換來自東西方的拉扯力道，能夠順利地將其轉換成為向中國求發展的攀附意識，也能夠成為向西方闡述東方意象的代言意識。悠遊在東西方之間的華裔離群者，既帶有東方的特質，也能夠以西方的詮釋取得有利位置，這也是為何新加坡華裔離群者能夠在中國學研究取得極大成果的原因。

### (四)、華裔離群的多重背景：限制？幫助？

對華裔離群學者的中國研究而言，多重背景的條件輔助了他們的學術能量，因為相較於單純的中國背景學者而言，他們有著西方學術的科學工具與理論方法，同時也具備了詮釋的權力；中國的出身背景給予他們瞭解中國的發展脈絡，使得他們相較於純粹出身西方的中國學者有著更容易進入中國文本的途徑。因此華裔離群者的多重背景為其塑造了研究的多重視角，當他面對不同的讀者群時可以設定不同的視角，因此對其中國研究而言則是重要的幫助條件。另外，華裔學者的西方背景幫助他們將自己的作品想法可以無障礙的介紹到世界，讓西方瞭解自己的論點所在，這是只受中國訓練的學者無法比擬的，同時他們也認為自己有責任與義務將關於中國的時事熱點議題讓西方世界瞭解，而非像過去任由西方自行詮釋所理解的中國。

### (五)、新加坡中國研究與西方中國研究的差異

中國崛起後更加吸引世界各國競相研究中國，雖然西方主流國家如美國將「中國」視為一個研究課題已經超過半世紀，但對於中文資料的掌握以及無法親身接近中國感到十分困擾，對美國而言，研究中國並不是對其存有文化想像或嚮往，而是將其視為區域研究的一環。對於同樣是政策上需要的新加坡而言，中國研究給予華裔離群者親炙文化母親的機會，對母國的鄉愁可以透過研究來獲得舒緩，或甚至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對母國產生一定的幫助或解釋。比起西方的中國研

究學者更多了身份上的能動性，這也符合東亞所在設定中國研究之初便假定研究者的背景會影響到知識產出，也可以解釋為何東亞所在尋找研究人員時總會尋找具有中國背景且同時受過西方名校教育的學者，雖然未必是全部的學者都具有這樣的條件，但以比例上而言，東亞所人事安排的考量的確呈現出這樣的思維與結果。

對新加坡而言，中國不該是一個感到困惑的課題。然而，在1994年蘇州工業園區的挫敗讓新加坡感受到不瞭解當代中國的危機，以及他們過去用自己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思維來思考中國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樣的結果使他們遭到空前的失敗，也讓新加坡加速對中國的研究與瞭解。從兩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額可以看出新加坡在這方面的自信與努力。

研究中國對新加坡而言還有另外一個優勢便是為「中國代言」，新加坡可以向西方提供關於中國時事熱點的資訊，如此一來便能掌握世界關於中國議題的主導，久而久之，新加坡可以成為中國議題的設定者與提供者，也能成為中國訊息的主要提供者，介於中西之間他們更能聲稱具有客觀中立的分析評述與報導。西方未來必然仰賴新加坡所提供的中國訊息。

#### (六)、華裔離群的客觀中立性是否存在？

華裔學者的中國研究試圖以一種超然客觀中立的態度來呈現在讀者面前，事實上，經由本研究分析這樣的客觀中立性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黃朝翰的新中國經濟論不斷強調中國經濟起飛所帶給周邊乃至於世界的好處，其論述或有數據支持，但學術界對中國的悖論（例如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論（章家敦、侯思嘉、閻紀宇，2002））未曾在其書寫中窺見，或是刻意避免抑或另有考量則不得而知；鄭永年的新中國民族主義，其為中國辯護的立場已然說明了他的價值觀傾向，「中立性」早已不復存在；美國華裔學者趙穗生身處西方國度裡，生存之道自是「客觀分析」，趙穗生選擇對中國不褒不貶，表面上迴避了自身的中國身份，但此種書寫策略，郭佳佳（2008）認為這只是反映了趙穗生在其處境下的一種生存方法，她認為他仍表現出對中國原鄉的同情情感，甚至替中國民族主義做出某種程度的澄清。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下，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公正而客觀地評論當代中國，華裔學者書寫策略的不同反映的是他所處的位置或其多重背景的影響，即使西方學者看中國亦或有類似的結果。因此，華裔離群者透過這樣的跨界流動過



程，讓新加坡中國學產生了迥異於其他地方中國學研究，也塑造了自身研究議程的獨特性。

華裔學者選擇用何種視角來研究及呈現中國，其實也反映了他在全球研究中的角色與地位。中國的崛起幫助了華裔學者強化其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能幫助西方國家透過他的解讀與研究來進入中國。亦即「中國」該是什麼樣子，可以透過他們的筆下來呈現，很大程度上可以主導中國研究的議題，同時也可以和西方辯論他們眼中的中國可能存在著謬誤。

新加坡東亞所選擇大量的華裔離群者來為研究中國、解讀中國，在方法論上便是設定了「身份」、「位置」與「研究」三者間的相互關係，若非作如此的推定，強調西化的新加坡大可以尋找一群完全西方的學者來研究中國，既不會遭受太過親近中國（pro-China）的質疑，也可以真正宣稱他們的中國研究完全客觀中立。但是東亞所的人才甄拔並未如此實行，可見前述的三者關係在東亞所主事者的思維中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 （七）、在中國出生的華裔離群如何認識中國

Robin Cohen 認為離散是「涉及身體居住在某一國家，但靈魂或精神旅行於該國家的時間/空間界域之外」。對黃朝翰而言，某種程度便是符合 Robin Cohen 的離散論述。他住在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但過去中國的出生及教育背景讓他的靈魂與精神在中國旅行，他用研究來表達對中國的立場，用數據及知識產出說服西方的知識霸權，或從提供西方中國情報的立場出發，為中國代言。他的中國觀是從自身的關係出發，建立在東南亞研究上，靠著東南亞的研究勾稽出和中國關係的輪廓，趁著新、中關係改善之際，站上了絕佳的論述權位置（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及東亞所學術主任）。他有面對西方的從容不迫，也有面對家鄉的回饋之情，他的中國認識脈絡是靠著血緣、知識詮釋權和新加坡與中國關係改善的契機下獲得發展。

黃朝翰和東亞所的研究員來新加坡的目的和過去的華裔人士有很大的不同，早期的移民是為了生存下去的理由來到南洋，來到新加坡；華裔離群學者來到新加坡卻是為了追求一個介於中西之間的論述空間，相對於西方的研究環境，新加坡反而可以提供他們更能進入與認識中國的捷徑。

#### （八）、在海外出生的華裔離群如何認識中國

廖建裕曾說：做為一個華裔沒有辦法避免中國的問題（廖建裕訪問稿，2007）。作為一個海外出生的華人，雖然廖建裕沒有濃厚的中國情節，但他認為由於自身的華人身分，其無法不去思考中國、瞭解中國。因為中國的各種作為常常影響著住在中國之外的華人，如果要了解印尼華人或東南亞華人的處境，就必須去瞭解中國（廖建裕訪問稿 2007）。在廖建裕的華人研究中，「中國」是被放在用來解釋與探討東南亞華人問題的位置。對廖建裕而言，「中國」是用來理解華人自身身分的途徑。另外，在文化面向上，中國對於華人而言可稱其為文化母國，廖建裕不否認自己與中華文化的這層連繫。但是，在他的家國情感方面，其出生地—印尼以及現在的移居地—新加坡，才是其情感投注的對象。與一般在中國出生的華裔不同，廖建裕的中國不再是具祖國或家園意義的地位。

王賡武的華人研究向來為學界所注意。因為他自己本身便是在海外出生的華人，他的研究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中國」雖然是他的「根」，但是現在他的家在東南亞，如此他可以以一個海外的超然視角來檢視中國，同時透過歷史的脈絡來進行回顧。

#### （九）、華裔離群範式對新加坡中國研究的影響

黃朝翰與廖建裕各代表著兩種可能的中國認識途徑。前者從取得知識霸權的信任而努力地運用詮釋權著手，後者則是從關懷華人的角度出發，帶有對移居東南亞華人辛苦求生存發展經歷的疼惜。黃朝翰和東亞所的產出對政府所做的中國政策影響甚大，從1994年的蘇州工業園區到2005年的中新天津生態城的投資等，所投資鉅額的背後都有其精準的政策分析與建議。對歐美學術界而言，其看似客觀的中國分析報告，也是他們重要期刊所倚賴的知識來源，在雙重方向的影響下，東亞所建立其在新加坡政府與學術界重要的聲望。主其事者影響東亞所的走向、研究員甚大。而廖建裕和華裔館的華人研究，不僅給新加坡也給世界一個認識華人群體的機會。華人群體有著多元的面貌，在不同地區、不同脈絡中的華人有著不同的發展，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有著多元的可能。另外，當新加坡欲從西化之路回頭找尋中華文化的價值時，華裔館提供華人回溯的線索與資料；當新加坡欲找尋自身的價值，華裔館以華人為主體的研究提供這份價值的基礎依據。

新加坡東亞所和華裔館都是新加坡重要的中國研究機構，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中國，一個投入當代中國的關懷，一個回溯華人的歷史脈絡，從知識者的產

出來看，他們試圖尋找一個看似不偏不倚的觀點來呈現「中國」，但在知識產出的背後卻仍顯露著他們和中國的關係，一個具有華人背景的學者在西方受到專業訓練，在其回到東方後，或許被迫可能自願的情況下隱藏他自己的中華性，或為工作或為生存，新加坡的華人從語言到學科訓練走的是歐美路線，整個社會呈現的是和西方接軌的「半西方」社會，藉由這樣的掩飾，新加坡能夠在建國之初的風雨飄搖，以及建國後和周邊國家不確定不穩定的關係下生存，同時也為了國內多達四分之三的華人尋找一個安身立命的出口，即使像陳之藩所敘述「失根的蘭花」般的悲戚，卻不曾斷掉他原本的「根」。嘴上的語言，知識產出所呈現的規格，在在符合西方的需要，但知識產出者自己內心屬於華人性的底蘊卻更需要被滿足。東亞所的黃朝翰透過找尋大批具有華人背景的研究員進行當代中國研究，華裔館透過歷史來回溯這一段他們不該失去的集體記憶，其實也正說明新加坡自建國以來為生存所採取的工具主義策略。

東亞所和華裔館的存在正是維繫新加坡發展與進步同時保留中華文化傳統精髓的重要憑藉，不論是東亞所的「工具主義」還是華裔館的「母國想像」，其實都讓新加坡的華人獲得一種中國認識的重要概念：他們處於中西之間，具備最大的能力來遊走於東、西兩大文明，頂著黑頭髮黃皮膚的他們卻是操著世界最強勢的英語，並能迅速且準確地以英文傳遞對中國的解讀，東亞所的研究正說明他們的企圖，而華裔館的研究則讓他們繼續瞭解和中國的關係，如此相輔相成的結合，提供新加坡華人對中國的特殊關係與想望。

#### (十)、移民理論與離散理論的應用

黃朝翰與其他到新加坡的華人一樣都是廣義的移民，黃朝翰具備了早期移民所缺乏的知識工具，因此他在移居地新加坡可以迅速地適應當地環境，而沒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對黃朝翰而言，移民並不是大問題，從他的祖父移民加拿大後，他的家族便開始一連串的移民行為，他的父親也跟隨祖父到加拿大去，他則是因為求學與謀職而到處移動，不僅在香港、英國及美國都有求學與客座的經驗，也在某些程度上受到這些國家的影響，其結果是表現在他的研究論述上或是行事作風上，他的研究面向全球，早期幾乎不以中文發表，大部分的中文出版品都是透過翻譯方式呈現，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以英文作為基礎語言，作為一個在中國出生的學者而言，他能毫無障礙的向西方溝通，甚至儼然以中國的代言者出現，以他的移民經驗來看，他在新加坡的移民經驗是最為成功的，因此他選擇在新加坡落

腳定居，並未再尋找下一個移居地。因此，如圖 2-3 所表示的狀態，黃朝翰是屬於最左邊的適應當地環境的移民，這和他的知識背景有關。故而知識移民以較好的教育背景和經濟條件可以迅速反應環境的變化，也能立即做出調整。這些也具體反映在他的知識體系表現，新加坡作為一個移民的外在環境，移民者必須隨著環境改變而改變，若是回溯黃朝翰的研究產出脈絡便可以瞭解新加坡和中國關係的變化，這是過去的華裔離群者未必能夠做到的適應環境調整。

關於「離散理論」的部分：華裔學者處在「居住地」(the place of residence) 與「從屬地」(the place of belonging) 兩者之間，打破了「領土」與「認同」兩者間的必然連結，身處異地的他們同時要面對代表西方學術界與代表祖國的至少兩種視野觀看的壓力，他們這種「既在內又在外」的雙重視角提供了一種「書寫空間」，這種空間可以解讀為因為不同的身份而有不同的書寫策略，因此我們可以藉著他們的知識產出來瞭解他們如何來「面對中國」的這樣議題，進而產生出不同的「中國認識」。華裔學者的特殊性在於不能單從離散視角觀察，而是必須以「全球化」的視角來論之，華裔學者並非悲情的離散者，他們比過去的移民多了許多選擇，他們可以選擇留下或離開，也可以選擇所在的處所，因此，離散理論未必能完全解釋華裔離群學者必然產生何種中國認識與想像。

### (十一)、華裔離群者的認同問題

華裔離群者的認同是隨著時間、環境及所處的位置進行調整與改變。以本研究的新加坡東亞所及黃朝翰而言，認同的基點自然在新加坡，因此他們的中國研究必須要以新加坡的立場出發，這是東亞所及黃朝翰等作為政府智庫的重要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工作環境影響認同，這和早期從中國移居到新加坡的移民不太一樣，如對移民認同的分析提到：「移民社會的特徵主要表現在認同中國和中國文化，落葉歸根的觀念強烈，雙邊家庭（移民分別在祖籍地和移居地建立家庭）的現象較為普遍，依照中國文化傳統的組織。」離群學者可以清楚地將認同分成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在工作中選擇移居地的國家，文化認同則是體現在生活中。

### (十二)、海外華人的三種範式

王賡武、黃朝翰與鄭永年三位東亞所的重要行政領導，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離群者。王賡武生長在 1949 年前的海外，他年少時期的中國觀大多來自自己的

父母及後來為期一年的南京大學就讀經驗，此後，他沒有再回到中國求學或工作，他的中國觀不是靠觀察，而是靠閱讀與想像。他認同的是中國五千年長久的歷史文化，這也是他解釋何以為「華人性」“Chineseness”，許多同樣在海外的華人具備華人性，但未必認同中國；黃朝翰在中國出生，幼年也在中國度過，但是他的成長與求學都是在中國外圍（香港）或國外（英國），當年中國的動盪是讓他被迫離開中國的原因，就像許多離散者必須離開的理由，他的心理仍是期待有一天可以回到中國，於是他選擇研究中國，在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改善之際引領新加坡的中國研究，也成功地讓新加坡大筆地投資中國，對他而言何嘗不是另一種衣錦還鄉？更具實際價值的是他的移居國新加坡也能在他的中國解讀中找到和中國的交往之道，更能趁著中國的崛起而能投資獲利，這更是信奉實用主義的黃朝翰所欲求的，站在他的立場，中國和新加坡雙贏是最好的結果；不同於黃朝翰與王賡武，鄭永年出生在中國建政後的1962年，他受完中國高等教育後才離開中國，然而他並非是被迫離開中國，因此他覺得自己有義務為當代的中國做出澄清，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誤解必須幫忙辯護，因此他的新民族主義論便是基於這樣的理由。楊大利和鄭永年的背景相似，不過他後來選擇留在西方發展，因此他的中國觀也隨著他的位置而有所改變。華裔離群學者因為時間與空間的變化進行的調整恰恰反映了中國內部的變遷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我們可以將當代華裔離群者的背景與身份策略以圖1表示。

圖1是說明華裔離群者的背景與身份策略，在X軸上的三個條件是指華裔離群者的背景：從原初的華人血統到必須在中國出生的華人，最右邊則為曾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Y軸項下的三個條件則為提供西方關於中國情報、向中國求發展的意識（如新加坡政府的策略）、為中國的辯解之情。這三項策略也分別代表華裔離群者在外發展、親身參與及站在中國角度發言的三項程度不同的策略。東亞所的出版品為西方提供中國的情報，黃朝翰的新中國經濟論為星中關係及中國做了解讀與辯護，並提供了政策上的建議，而鄭永年的新民族主義敘事則和西方辯論，為中國辯解。所以按照這些條件分析則東亞所華裔學者的知識產出既提供新加坡政府也提供西方國家瞭解當代中國；黃朝翰的新中國經濟論提供新加坡政府到中國求發展的理由，鄭永年的新民族主義策略則力抗西方對中國的誤解，並站在中國的立場為其發言。<sup>2</sup>

<sup>2</sup> 關於鄭永年的新民族主義敘事可以參考郭佳佳，離散者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學者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份策略，（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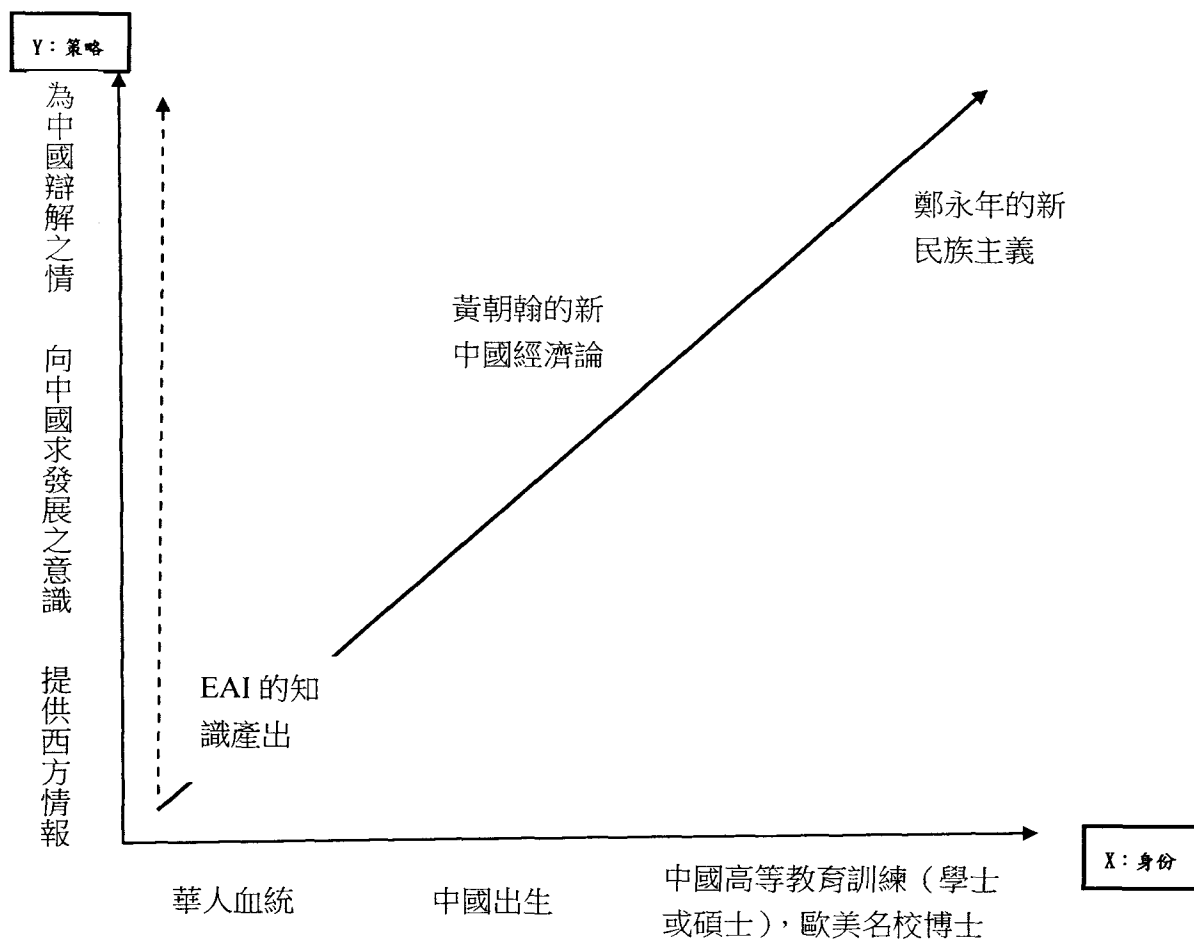


圖 1 華裔離群者的背景與身份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說明：——→方向與強弱性，實線為強，虛線為弱，在 X 軸上，從左到右標示著華裔離群者的背景條件，在最右邊的中國高等教育訓練背景預設了他受中國的影響為最大。僅具華人血統的影響應該是最小。

## ◎ 研究建議

### (一)、族群離群者是全球化下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做為新加坡華人中國認識的研究只是一個開始。本文認為不僅要關心離群者的歷史，更要關心離群者的心理狀態。美國常不時傳出美籍某裔的人士因為既得不到當地人的認同，又無法回到自己的祖國尋求支持，即使他們多次表明

心，2008)。

了對於移居地的認同，但卻還是受到當地人士的排擠。於是他們採取激烈的手段，可能是槍殺同學、同事或同袍，<sup>3</sup>也有可能以激烈的守法殺掉自己的下一代。<sup>4</sup>這樣的悲劇其實在上個世紀乃至於上上個世紀就在全世界各地上演，許多人為了生存離開自己的家鄉而到了心目中的新大陸去，但是卻遭受各種歧視與欺凌，或能默默忍受、或者逃離回國，這些離散者的故事在全球各個角落上演，移居國不歡迎、母國又未能給予他們適當的保護，因此他們往往是最為弱勢的一群。為了能「落地生根」，他們努力學習語言、努力和當地同化，他們成功的經驗獲得了傑出的成果，但是在他們內心深處其實仍存有著對母國的想望。

研究者如何能夠探究離散者的內心狀態，除了透過文本外，另外就是透過深度訪談。本研究建議未來若有相關的研究時，可以將文本與深度訪談做結合，研究者可以在進行訪談前先瞭解被研究者的著作產出，再充分掌握被研究者的文本問題意識後，可以更進一步獲得需要的資訊。

## (二)、多元包容理解當代多元族群認同與意識

如前所述，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國家都不再是單一民族所構成。但是新加坡的華裔離群提供有許多種族所組合而成的國家一個借鏡，在國家身份論述的建構上，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拋棄本位主義，離散理論告訴我們離散者具有若干的特性，他們的認同是多重的，主政者恰可以利用他們的多重認同來營造國家多元的特色，甚至在建構身份論述之時也能倚靠這樣的背景而有別於其他國家。

## (三)、海外華人研究發展的新方向

19 與 20 世紀中國和世界經歷了許多戰爭與天災的危機，造成了許多中國人被迫離開自己生長的土地，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過去，離群者要離開自己的家園到外發展必須要有極大的勇氣，經過超過一世紀的發展，他們在異地寫下許多動人的故事，同時也取得重大的發展，他們甚至在獲得事業上成功之十也努力回饋

---

<sup>3</sup>最為人所震驚的是發生在 2009 年美國德州中部胡德堡陸軍基地的殺人事件，一共造成 12 人死亡，二十多人輕重傷的慘劇，兇手是一名具有穆斯林信仰的美籍中東裔人士，據報導他常遭到身邊人士的騷擾，是否造成殺機則不得而知。(法新社，2009)

<sup>4</sup>一名來自伊拉克的 20 歲女郎「努爾」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郊區，被父親開車撞傷，經送醫傷重不治死亡。「努爾」是在上個月 20 號受傷送醫，(當地時間)星期一在醫院去世。她的家人說，「努爾」的父親「法勒」不滿女兒過度西化，不依照伊拉克傳統的價值觀生活，因此氣得開車撞傷女兒，隨後逃往英國。(謝佐人，2009)

自己的故鄉：中國，例如張進福、陳嘉庚、陳六使、李光前等人，他們不僅是捐輸中國幫助國內的革命運動，甚至在海外成立的革命前進指揮所，在心理上他們希望自己的母國可以變好，那麼或許自己也有可以「衣錦還鄉」的一天；陳嘉庚等人則是致力於中華文化與教育事業的發展，在海外賺的錢未必花在自己和家人的身上，但卻努力捐輸到中國成立大學與中學，很大程度上便是以行動表現自己的中國情懷，南洋大學也是在這種思維下產生，經過海外傑出華人的努力奔走下，一個海外促進保存中華文化的堡壘在中國之外的地方誕生，延續著不僅是中華文化，更有一份對母國的懷念與想望。

#### **(四)、新移民政策的制訂建議**

台灣社會現在也充斥著許多新移民，有許多也是來自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移民。他們來到台灣的目的可能是因為工作、家庭及婚姻等因素，本研究的內容曾經述及移居國的移民政策會影響他們和當地族群的關係並對他們的認同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事實上，「移民」是全球化下的一個普遍現象，任何國家都應該敞開心胸接受移民，同時也要營造一個對移民友善的環境，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家當推美國，因為接受大量移民而造就美國強盛富裕的今天，但美國仍有許多種族衝突的問題，在移民或族群政策上也是經歷過許多時期的調整，因此台灣要選擇對移民友善或是排斥，政府的態度十分重要。從東南亞華人的經驗可以告訴全世界的政府，移民可能因為某些因素的驅使讓他們特別認真努力，不論對他們自己還是遷居國都有很大的幫助，在上個世紀末印尼仍然發生令人遺憾的排華暴動，這些都是政府在相關政策制訂過程中所造成的結果，如何促進族群和諧乃至於讓移民變成定居的公民，甚至建立他們新的認同是族群政策必須要思考的重點方向。

#### **(五)、未來海外華人族群在當地的發展趨勢**

海外華人的課題在 21 世紀仍是方興未艾，尤其是許多海外華人的重大共現在近來逐漸被發掘出來。從上個世紀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靠華僑幫助而擴展，因此有所謂「華僑為革命之母」的說法。華人的發展在未來可能仍有許多命題值得研究與觀察：

- 一、華人在海外的分佈是否會繼續擴大？
- 二、華人在中國的崛起中扮演何種角色？



三、排華問題是否已逐漸消弭？抑或轉化另種形式的歧視？

針對前述的三個問題，主要關心的是全球化的幫助下，華人有比過去更為方便的移動方式，對於具有高度移動能力的華人而言，他們是否會再將活動勢力範圍擴大到遍及全球？抑或只有選擇留在現居地？這個議題同樣適用在中國崛起後，人民出走的意願是否會降低？如果離開又是基於什麼考量？會選擇哪些國家？

已經定居在海外的華人在中國崛起後的角色為何？是否會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協助中國在海外的勢力擴展？抑或只是冷眼旁觀中國，不再認為自己和中國有所牽連？這些華人族群在入籍本土化後，對於中國的態度又是為何？這些議題都是中國崛起後值得高度關注的重點。

1998年印尼的排華運動殷鑑未遠，雖然已經有超過十年不在出現大規模的排華運動，但這是否就代表華人已經和當地土著和平相處？印尼、馬來西亞或其他有華人聚集的國家，他們的政府是否開始制訂對華人的友善政策？華人在高度本土化後的社會氛圍是否已經不再對於華人抱以另外態度？

印尼的華人處境提供了一個關於排華運動研究題材，印尼的華人總數大約有六百萬人，為數雖然龐大，但是卻只佔印尼的總人口數不到3%，但是華人卻控制了印尼超過一半以上的經濟活動，<sup>5</sup>在承平時，華人可以過著安寧的生活；但是遇到經濟動盪之時，華人就變成了印尼土著攻擊的對象，自印尼獨立建國後，「排華暴動」屢屢成為當地重大的種族衝突。因此，華人的特殊處境將可以成為海外華人研究的重要題材。

## ◎ 研究展望

本研究選定華裔離群作為研究的基礎，事實上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各種人口快速移動，全世界都有非當地族裔的人士當選領導人，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2008年甫當選美國總統的歐巴馬（B. Obama）。他是非裔美籍人士，嚴格說來他也是「離散者」（African Diasporas）。過去由離散者當選領導人的還有泰國的塔克辛（華裔）以及秘魯的藤森（日裔）。

華人研究並非新課題。國際知名學者王賡武在此領域耕耘多年，但是觸及

---

<sup>5</sup> 印尼有些領導人認為印尼的華人控制了超過七成的印尼經濟，哈比比當副總統時曾在日本公開表示：僅佔3%的華人控制了90%的印尼經濟。不過廖建裕認為這些說法都是言過其實，具有誤導性的，（廖建裕，2002:15）。

到華裔離群者的中國認識研究，目前類似的文章仍屬有限，未來如何整合此一部分將是此研究最亟待發揮及深度鑽研的重要領域。

### **(一)、新加坡華人族群的分類方式建立**

新加坡的華人總數雖然和鄰近國家相比並不算太多，但是其總數佔了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更重要的是這些華人因為到新加坡時間先後的差異，教育與職業的不同以及從中國不同省分的關係，新加坡華人族群有了明顯的分別。在本研究中，因為將焦點集中在新加坡高級知識份子的華人，因此未能對新加坡華人做出直接的分類標準。但是從本研究中可以瞭解新加坡的華人差異性所產生對中國認識的分殊性，極有可能是建構在前述的各項因素。因此，未來若能建立新加坡華人族群的分類方式及可操作化概念將是新加坡華人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有助於理解新加坡華人對中國情感的差異性來源。

### **(二)、比較全世界各地華人的角色與認同轉變**

目前全世界均有華人的分佈，華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歷史時空背景及不同的因素推拉之下到了遷住國，這些華人帶著部分的中華文化和當地土著文化產生撞擊，有的和當地的文化相互結合，有的則是成為當地的文化特色或主流文化，有的則是歸化當地文化逐漸被土著同化而不再保有中華文化的特性。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加以關注的課題。

### **(三)、比較各種族裔的離群者在母國認識上的差異**

華裔、非洲裔、印度裔與猶太裔是目前世界上備受關注的四大離群者。華裔的研究過去多從歷史著手，關注他們在移居國的生活情形；非洲裔因為曾經和華裔相同的苦力遭遇，在歐巴馬當選總統後開始受到注意；印度裔隨著金磚四國之一印度的崛起而有著不同的命運發展，猶太裔則是流離已久，他們的對母國的認識與認同同樣備受討論。這四種族裔的離散者，他們在全球化的今天對於自身母國認識是否存在極大的差異？這差異的因素又是為何？這些比較在離群者高度發展下非常具有探討的價值與意義。

### **(四)、建構台灣當前海外華人研究的學術脈絡與網絡**

台灣作為一個海外華人研究的重鎮之一，擁有許多重要的資源與學術機構，

在過去國民黨時代的華僑政策號召之下，海外華人對於台灣友善的程度遠大過於對中國。然而，在中國近年極力對海外華人示好並加強相關研究政策的思維下，台灣應該要加緊把握現有的研究優勢，尤其是在1949年前後，海外華人仍然對中華民國存有高度認同，即使到現在，許多華人仍尊奉孫中山為國父，尤其新馬華人對於孫中山在一百年前在南洋的活動仍津津樂道。台灣在這方面的研究資源與史料目前仍是箇中翹楚，但是若未能持續在這方面努力，恐怕海外華人的學術網絡將無以為繼。因此，未來的海外華人研究重點應該放在對東南亞的華人身份認同與轉變分析，並加強和新馬地區的華人研究機構橫向聯繫，如此便能建立屬於台灣的海外華人研究學術網絡。

## 七、附錄

### (一) 蒐集資料部分影本

#### 1. EAI Bulletin(東亞研究所通訊)

Sept 2008

Vol 10 No 2

MICA IPN 073/02/2008

# eai bulletin

a publication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東亞研究所通訊

**INSIDE PAGES**

\*\*\*

**The Heir Apparent Clears the First Hurdle**

Now that the Games are over, what will Beijing Look to?

**Former Prime Minister Fukuda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How will the Olympics Change China?**

**No Medals for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inues to Cool**

**Volunteerism: Beijing Olympics and Beyond**

**More Liberal Media after the Olympics?**

**Beijing Olympics as the World's First "Technolympics"?**

**EAST ASIAN INSTITUTE**  
**NUS**

## The Heir Apparent Clears the First Hurdle

*Vice President Xi Jinping moderated the tone of the Games and redefined the sports event with rationality and calmness*

**HO ZHENYUE**

**F**or Xi Jinping, No. 6 standing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uccessful Beijing 2008 Olympics Games is paramount not only for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world but also for his political career as the heir apparent. After having been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managing China's coming-out grand party, Xi has displayed fine qualities as the next leader of an emerging major power in the world.

**XI JINPING IN CHARGE OF THE OLYMPIC GAMES**

As a result of a semi-competitive straw poll conducted for the candidates of a new Politburo, Xi became the frontrunner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leadership in China at the 17<sup>th</sup>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October 2007. In addition to his position as No. 6 in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the only Politburo standing member in the Secretariat, he was subsequently elected vic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rch 2008, further consolidating his position as the heir apparent to President Hu Jintao. Although he has accumulated extensive local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a number of provincial units such as Fujian, Zhejiang and Shanghai, Xi is undoubted in handling state affair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n the reshuffle of central leadership portfolios after the 17<sup>th</sup> Party Congress, Xi was apparently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of managing the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on behalf of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The Olympic Games will not only be a grand coming-out party for China but also provide Xi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arn credits as a worthy heir apparent.

**FROM "THE BEST OLYMPICS" TO A "SAFE OLYMPICS"**

China leaders were initially exuberant about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China's great achievements in sports as well 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as it is China's first as an Olympics host. With "One World One Dream" as its official slogan and "Green Olympics, Scientific Olympics, and Humanity Olympics" as its official goal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aspired to win recognit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one of major emerging powers to host the best Olympics ever in history. During his tour of Olympic facilities on 15 February 2008, Xi exhorted the organisers to make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a grand party for facilita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eoples of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one world" does not seem to share "one dream" with China. In the aftermath of Tibet riots in March 2008, Beijing found itself in a public relations quarantine. Human rights groups, Tibetan independence forces, and Western politicians condemned China's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the torch relays of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were sabotaged in a number of Western cities. Some Western leaders (in particular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even promised their abstention of

*continued on page 12*

# East Asian Policy

a publication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MICA (P) 001/02/2009

## ESSAYS

- **China's Talent Schemes**
- **PAP's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 **East Asian Experi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Japan's New Asian Policy**
- **The Rio Tinto Affair**
- **Rapproche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Ma's Presidency**

## China in Central Asia

*China's trading activities and energy investments in Central Asia have increased since the 1990s. Many analysts expect Chinese influences to increase in the region. However, findings show that this is hardly the case.*

## Sino-Russo Arms Tra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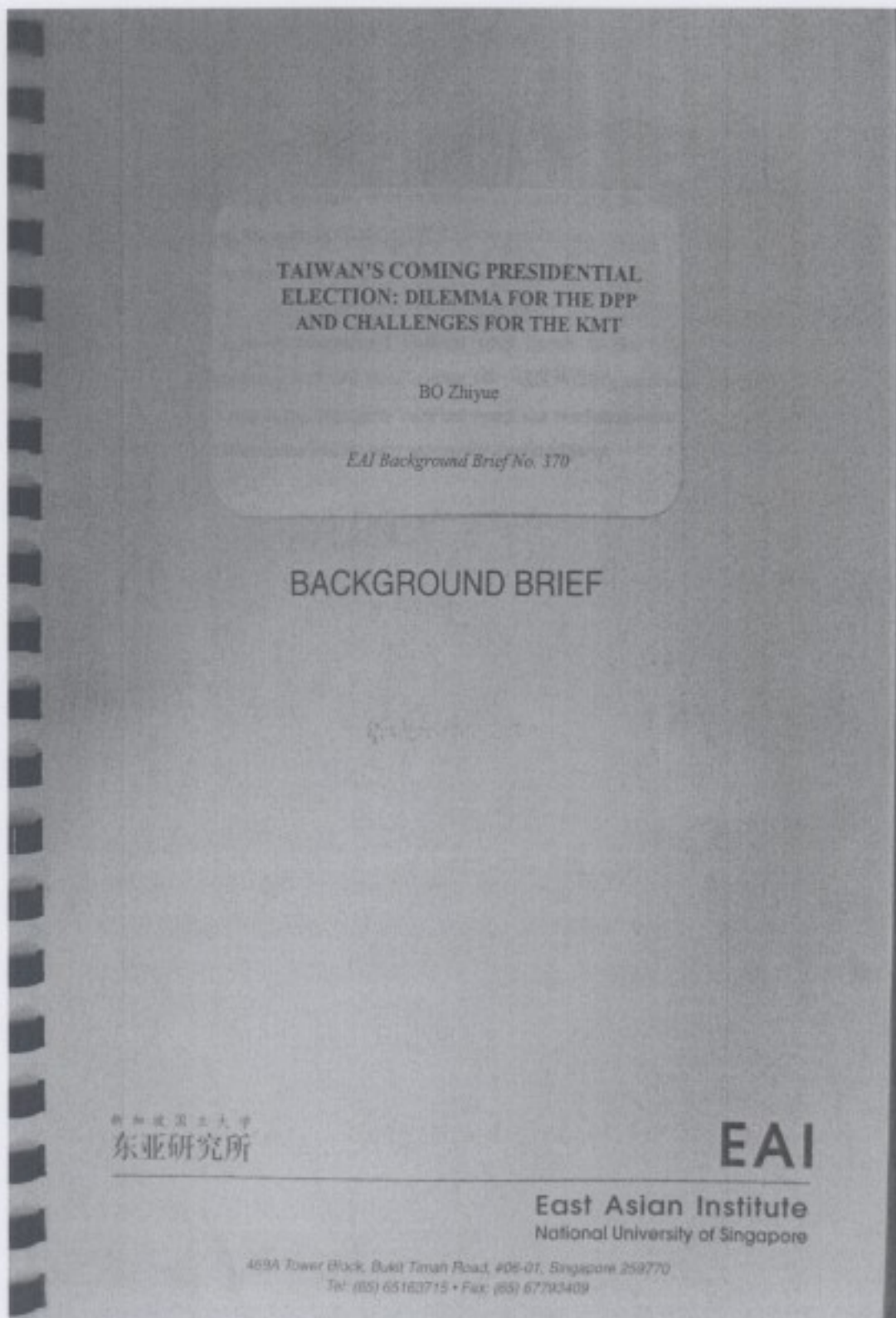
*China now seeks technological transfers more than hardware acquisition while Russia's increase in overall arms sale with minimum Chinese participation suggests that Russia has found alternative mark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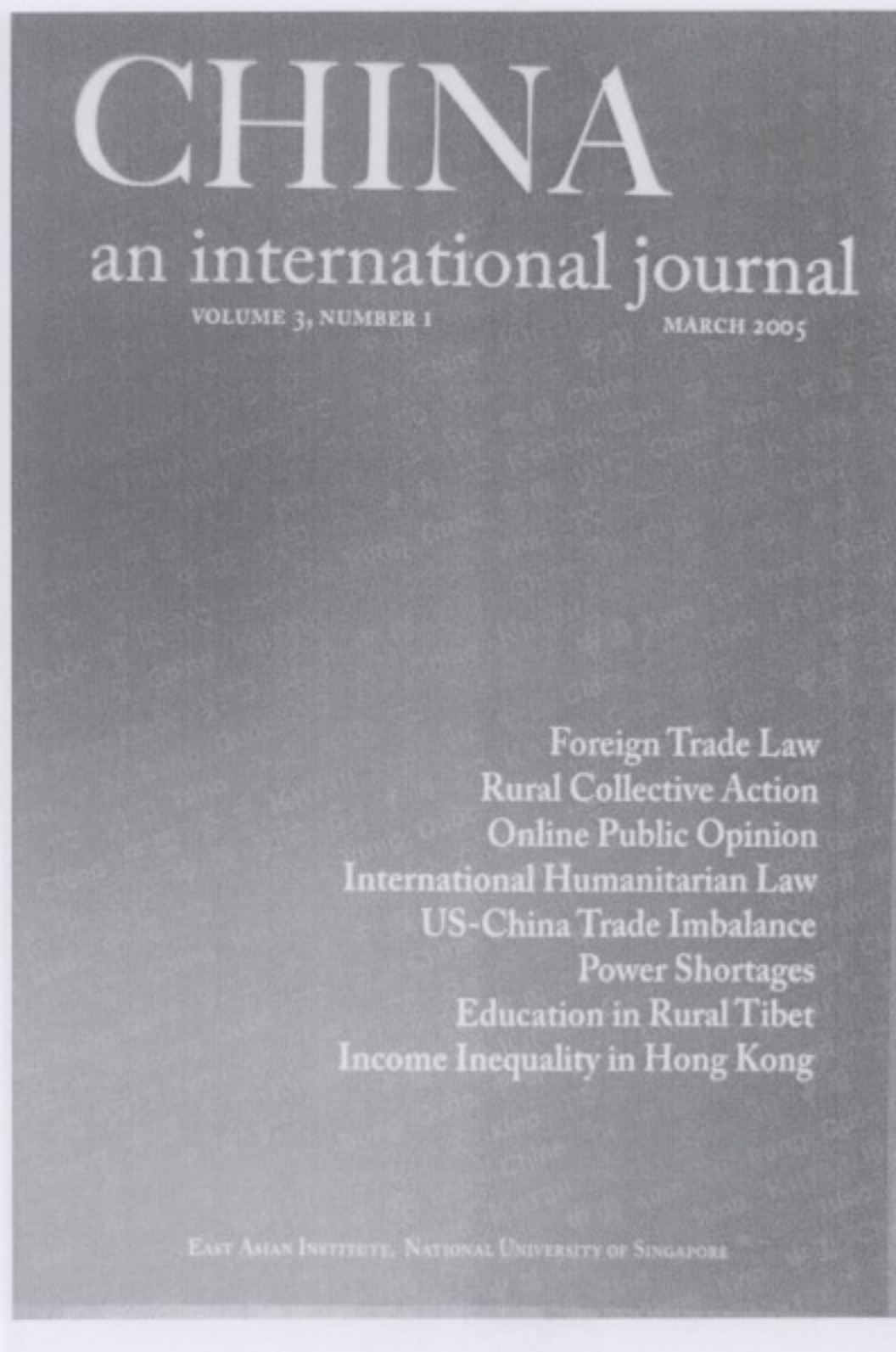
## China-India Relations

*China se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its relations with India. Promot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figure importantly in China's policy towards India.*

**Special Feature: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3. Background Brief(背景報告)





#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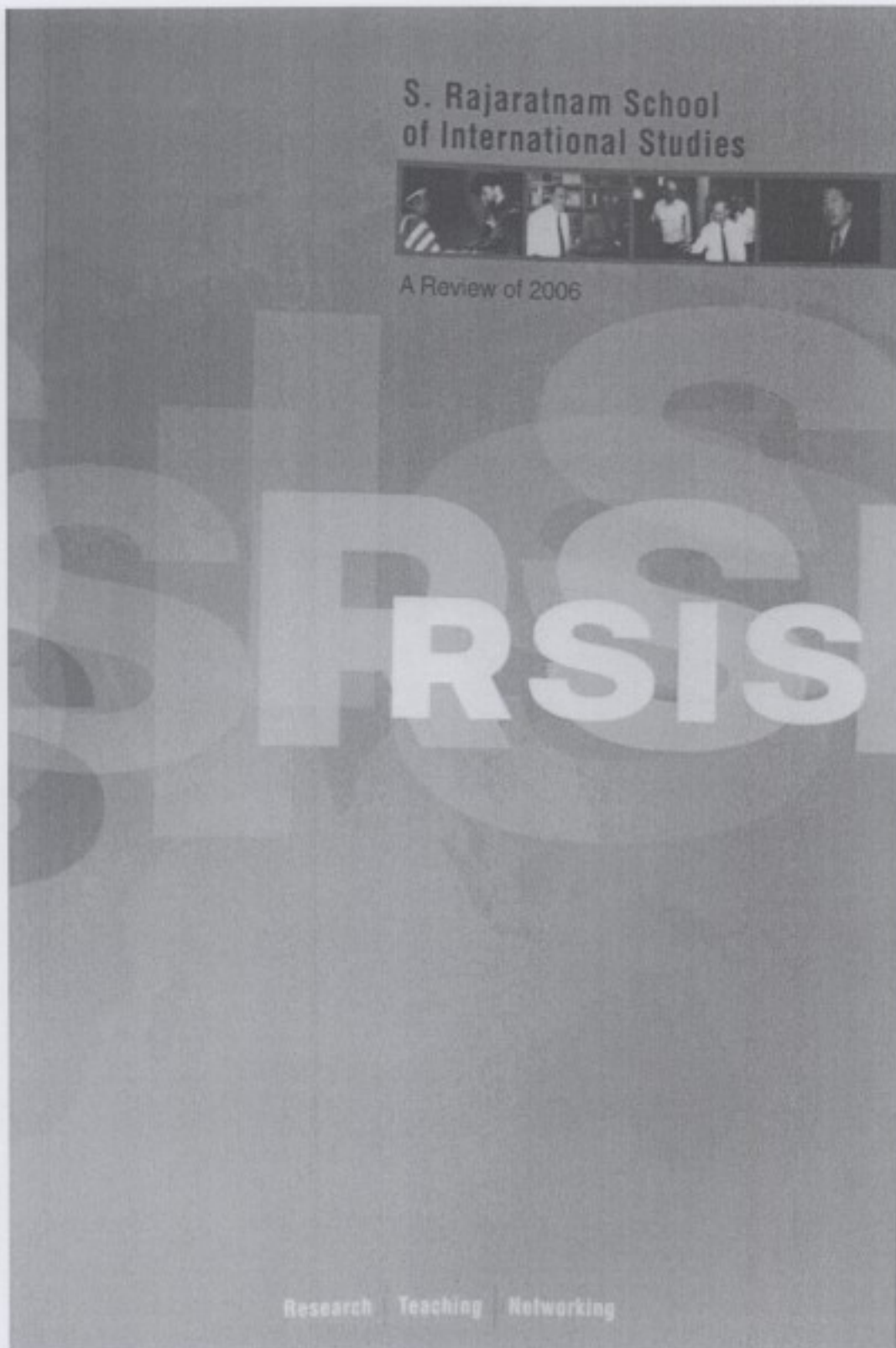
Zheng Yongnian



China Policy Series



6.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SIS)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Graduate School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Soft Power**

*18<sup>th</sup> – 19<sup>th</sup> October 2007*  
*Orchard Hotel*  
*Singapore*

*Organized by*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 (二) 訪談記錄 (黃朝翰訪談記錄摘錄)

### ◎黃朝翰的學思背景：(以下第一人稱)

我並沒有思考過為自己做口述歷史。為此訪談工作，我將自己的履歷重新整理了一下。

我從事學術工作的時間非常長。事實上，我很早拿到 Ph.D，1966 年就取得學位。已從大學教職退休，目前工作的研究所性質上屬半智庫。我們研究所創辦於 1990 年，初期由我擔任所長(director)，後來王賡武擔任研究主任(research director)。所裡人事中，就屬我們兩人最老。後來再找接班人，找得很辛苦，主持政策智庫型研究所的人才本就不易尋找。本來我今年夏天要退休，但李光耀要我再留一、二年，幫助新所長楊大力過渡。你們手上現在拿的這本書是我與王賡武合編的。我從 66 年開始到現在，在學術方面仍十分投入，我自己早期在香港的學生都已經退休了，我的特點是我做學術的時間很長。

我的社會、家庭、教育學術背景很複雜。我出生於廣州台山，去美國 China town 都是我們這種廣東台山背景的人。我的廣東話並不算標準。19 世紀末祖父去加拿大 (16 歲)，早期從事洗衣業，後來在餐館工作，因為內戰未返國，90 多歲病故於多倫多。父親為醫師，在中山大學，1949 年在廣州癌症過世；1955 年母親帶三個弟弟移民加拿大。早期年齡與文件都有問題。

台山華僑重視第二代的教育，早期留學主要是兩種人，官派或來自福建廣東的華僑子弟，很多念物理、化學的博士很多。我人在 1979 年剛改革後，曾偷偷摸摸地從香港回大陸，發現我們是博士村(village of Ph. D.)。當時用香港身分證進去三天，四人幫剛下臺不久，接待的是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因為我是華僑，在統戰政策下，還全程免費。後來新加坡安全局知道，曾造成我很大麻煩。

我的小學教育在廣州，解放後在香港念初中 (親國民黨)。但很多是親國名黨的當時香港中學學校分三派：本地官校是英語教學、少數是左派，好像台灣教育。我在 1955 年轉入英語學校，如果我繼續念中文學校，我後來會沒有前途。我有些同學去台灣念大學，回香港沒工作。我在英文書院就讀，預科會考考得不錯，入 government school，香港那時候有三所比較好的官校：Queen's College(QC)/King's College(KC)、Queen's Elizabeth College(QES) (我念的學校)。中學畢業之後，考進港大，許多香港政府菁英、官員都是我的同學，包括 97 後第一位華人警察總監。另一種是教會學校，屬基督教或天主教，elite school。我預科考試考得不錯 (A-level) 所以我可以進去官校(QES)。一般家庭環境不好，中學校畢

業後便做公務員，我進入香港大學（HICU）。港大精英教育，很難考進去，很多教授水準不好，但影響力大。我想還是比中國的好，北大教授基本馬虎，好學生不大理教授。

1962 年畢業，大部分港大同學畢業後出來做官，比如陳方安生（和我是同年）。早期沒有華人做高官(A0)，僅一二位。在香港大學我主修 economics，屬於文學院。英國社會科學不如美國發達。香港學者對中國不了解，香港主要兩種人，大陸移民和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中國沒興趣無法做中國研究。移民像我一樣，在香港沒有根，對中國發展反有興趣。

1950 年代香港開始工業化，53-55 以手工業為主，當時台灣還沒起步。1950 年代香港也做轉口貿易，地方小，是非常初期的工業化，有上海幫（浙江、江蘇、北方人）跑過來，還有潮州人，李嘉誠就在當時起家。上海人理髮、做洋服、開茶餐廳和別人不同，很聰明，而且上海人很乾淨，包括外省人（非廣東人）都作得不錯，50 年代香港經濟慢慢開始發展。60 年代，第一批難民潮入香港就是 1962 年開始，過不了香港邊界的人都被遣返，但走達九龍就算香港人，香港政府就給身份，不然就變成暴民，這是第一波（first wave）。

66 年我從英國回港大教書，剛剛開始暴動，文化大革命，71 年去新加坡。香港大學的畢業生出路有兩種，一是教中文，一是在政府做官，做高官（A0）一定要 1st class honors，或者就是 2nd upper class。畢業之後，我在大學擔任助教工作，改變了我的前途。次年，我被送到英國留學 3 年，從 63 年夏天到 66 年底，在倫敦大學求學。在 methodology 與概念上，受到很大的影響。66 年我回港擔任講師 lecturer。講師作了差不多五年，並不開心。我是港大第一個拿到經濟學的博士，當時港大幾乎都是洋人教授，即使在數學系甚至中文系都這樣，而本地人講師沒有住房津貼。我們當時的系主任是美國回去的華人，我與他關係不好，我覺得他學術不太行，念 economic history，人家瞧不起。我比較 independent minds，1971 年我到澳大利亞開會，路過新加坡，對新加坡印象很深，後來決定移民新加坡。

對中國問題，我大學時已經很有興趣。小學已開始看報，對 current affairs 有興趣，但一般香港學生對中國、共產黨沒有興趣，只有本地新聞。英國殖民教育沒有教近代政治，不鼓勵。我對國民黨早期、淮海戰役、汪精衛等 current affairs 有興趣。我在當助教時已經跟教授一起作中國研究，60 年代 China Watches 都去香港做研究，老一輩中國學者如 Dwight Perkins 都待過香港。我在倫敦大學時，

一年 master, ph. D 寫中國土地改革問題，屬於 economic development 經濟發展這一科。Lincoln Center 當時是很重要的，現在變成 political economy。我當時還學農業經濟，所以我與李登輝有接觸，因為李的論文是經濟發展和農業經濟。

我的第一本書，NY1973 出版。去新加坡前，曾去美國林肯研究中心六個月修改論文給 Berkeley review，但三個評論裡只有兩位審稿人同意，所以不能出版。後來改送 Praeger 審查，書很快就出版了，Perkins 引薦我，Ishikawa 評論好。

英國精英教育強調不停看書，但不做研究。我有中國、英、美背景，美國就是強調 practical，要發表。我一去新加坡就是 senior lecturer，那時新加坡剛獨立，很多大學講師沒有博士。英國從 1965 年開始擴張大學，成立很多新大學，英國那時很多大學校講師都沒有博士，我很多倫敦同學沒有畢業就是 assistant lecturer，我如果留下，到 SOAS 工作，career 就不同了，後來英國高教政策緊縮，就永遠沒有機會升教授。

香港是英國統治的，中文大學那時才剛開始，主要是港大，沒有出版壓力，兩三篇 article 就可以，大家就是看書，debate，在 Senia common room 喝酒、討論。

倫敦經濟學院(LSE)影響我很大，我本身懶惰，但記憶力好，不喜歡看很多書。在倫敦卻開了眼界，eyeopening。那時，每天中午都有 Public lecture。倫敦非常國際化，有些觀點聽了不可能接受，聽聽而已，在那裡學了 hypothesis testing，受 Popper 影響，very rigorous，有同學從此崇拜他。Popper 反共，強調假設、疑問，強調主要論點，不要搖擺。現在去大陸，大陸學者沒有中心思想，永遠不可能證明任何東西，只有靠口才，一句話同時有 normative 和 positive 觀點很不好。我對大陸學者，告訴他們社會科學 it is always a matter of degree，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中國的學術文章沒有 hypothesis，一句一個 position，中國人的爭論方式有大問題。東方總是要最後總結。西方一開始先 conceptualize，economics is not to support the recommendation。

我現在審評文章的標準也是這樣，每個月會送 3 至 4 篇報告給政府。我受我前老闆吳慶瑞影響很大。基本上我也崇拜李光耀，雖然很多年輕人從外面看會批評他，但我真的很崇拜他。

我們研究所研究重點中國、日本、台灣，我們的報告是 informative。告訴他們政府 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never make recommendations。所以同樣的文

章我們不能給朱鎔基、溫家寶看。

我兩個弟弟從加拿大到美國發展，都移民美國，一個拿到 Ph.D，一個姐姐、弟弟還在多倫多，清明掃墓時要去多倫多，因為祖父母葬在那，我父親骨灰也運到加拿大。新加坡大學與香港大學早期殖民地時就有，兩邊制度、水平差不多，早期教授也互通香港大學最好的是醫學院。我去新加坡 1971 年新大還有反殖民風潮，把很多洋人趕走，歡迎華人，我太太不用 interview 就有工作，當時新加坡沒有 ph.D in sociology 的女性，她留學 Berkeley。我太太學問方面都比我高一點，我們是港大同學，她家有錢，我們在 67 年結婚，當時她在中文大學。她在新加坡第一個是見了李光耀留下很深的印象，1985 年李光耀叫她從政，是 85 年第一批三個女議員之一。我 70 年代在新加坡教書作研究，那時有作東南亞研究，也作一點中國研究。

綜合說來，我的 Career turning points 是：去倫敦，去新加坡，去東亞所。我因為擔任港大助教時有機會留學英國，才開始做學術；如果不是去英國念博士，我會留在香港當公務員。第二個轉折點是到新加坡，最後一個轉折點是吳慶瑞看重我，請我主持 IEAP，從大學到政策研究所。

90 年我太太擔任衛生部長，也是第一位女性部長級官員，後來做教育部，5 年前退休，做 public housing 主席，我和官方關係很好，一方面透過她，一方面是因為吳慶瑞。

吳慶瑞是 no. 2 的人物，僅次於李光耀。他是出身 LSE 的博士，但還是崇拜李光耀。他就是率直，和他相處一兩個月和得來，他就永遠照顧你。他與中國官方關係很好，早期趙紫陽的兒子與秘書都在 EAIA，新加坡對中國研究的安全很重視。

我如果留在香港，前途發展有限。早期新加坡薪水低於香港，但我那時年輕不管，新加坡可以有傭人保母，太太有專業，可以有工作，有好的 career。美國學術較嚴肅，我受美國 push 的影響來自她（太太），不出版不研究會被看不起，總是 try to update。英國具有 gentleman 性格，不想太過份，比較散漫。If I am a young man today, I will go to America。現在因為全世界精英都在美國，聯繫關係都在美國；我如果在台灣的台大畢業，我會去大陸北大然後這樣一輩子沒問題，像英國人 Oxford 或 Cambridge 畢業一樣。

我在香港時，但卻不是香港角度的 outlook，我的思考常常不限於香港。但我在新加坡同時很喔 never look beyond。新加坡只懂東南亞，我在新加坡做所以

我做都南亞中國研究的資料，Perkins 轉韓國，Chalmers Johnson 轉日本，去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東南亞沒有所謂東南亞經濟，我是第一個 look beyond 東南亞的學者，也研究東南亞有了名氣。我認識吳榮義、林大侯，後來我成為唯一的中國問題專家。

很多人在美國研究 Soviet type economic。50 年代劉大中控制中國經濟研究。他本身作很好的理論經濟，曾回北大搞國民收入，但永遠反共，因家裡財產被沒收，但經濟研究很傑出。美國要理論經濟好才能做中國研究，現代經濟走火入魔，國大年輕同事全都是從工程轉來經濟的，做的全都是數學。新加坡大學社會科學太美國化，排名很重要，研究太分殊化，過度專業化。文章必須到美國發表，書不算，出期刊文章太專了，很多年輕人不做中國經濟也是因為這樣，因為無法出版，沒有學術貢獻，就不能升級。美國博士很重視 comprehensive，什麼都要懂。學術應包含 technical 與 intellectual，我們在東亞所做研究，吳老闆要求一定要 non-western，non-PRC。

早期洋學者做中國研究要去香港，香港的重點基本就是中國，台灣早期資料不開放，最好的資料庫就在香港。60~80 年代，看台灣對 china watching 的研究，除了美國，台灣是最好的，但台灣資料找不到。

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在 1950 年代中斷，因為東南亞一般反共：50 年代韓戰、之後的冷戰，1955 年亞非不結盟運動，在萬隆舉行會議。泰國基本上反共，馬來西亞有馬共的問題。新加坡與香港不同，有左派，比較親中，不管誰在中國做皇帝還是親中國。因為馬共的影響，共產黨在馬來西亞是非法的。東南亞因為恐共對中國了解因而中斷。

李光耀利用左派上台，但一上台就抓左派，有點恐共。70 年代已經改變，沒有反共，開始關係正常化。1972 中國與新加坡進行乒乓外交，新加坡有華語教育，對中國有感情，觀眾幫中國選手加油，李光耀很生氣，公開罵，那時中國報紙全部不能進新加坡。國防部吳慶瑞覺得不對，不能太過反共，you must teach what Maxism is。

新加坡還是比較開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因為恐共都發生過排華，基本上都沒有研究中國，馬來西亞 1974 年與中國關係正常化，1975 年則是菲律賓、泰國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新加坡最晚。

經濟發展，歐美之外最早起飛的是日本，70 年代四小龍經濟發展起飛，人口均不足 5000 萬，出口佔全部落後國家的 60%。從日本到四小龍，其經濟發展

必然有文化因素。儒家思想是正面的，注重教育與節儉，注重教育帶來人力資本，節儉帶來儲蓄，但發展後有社會問題，影響安定。西方國家不一定好，李光耀擔心太西化，他認為中國 must be something good。之後建立東亞研究所，1986年吳慶瑞退休，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中國找他擔任經濟顧問，他與古牧私交好。發現新加坡對中國認識不夠，認為 we must look at China from its own way，所以在六四之後，對儒家文化的研究轉型成 China watching。我們研究所經費很多，買很多書，蒐集了中國全部的統計年鑑。

李光耀與吳慶瑞兩個人都是 English gentlemen。政治家年紀大了以後 get philosophical，他們人覺得 5000 年持續的文化，there must be something good about 中國文化。

### ◎黃朝翰談東亞所建立過程（以下第一人稱）

我想講一下我們研究所創辦的過程。我們這個研究所，開始不是大學裡一般的研究所，在門口掛一塊招牌而已。我們是獨立的、全職研究所。

新加坡這類研究所不只一所。第一座是東南亞研究所，在 1969 年成立，是吳慶瑞創辦的，新加坡最重要的機構都是他創立的，這種事情李光耀不出面，東南亞研究所的英文名字是 ISEAS，世界知名。該所原來用以訓練熟悉東南亞事務的外交官，後來在一個印度學者領導之下，轉型成為區域研究學術機構，是 the only one and the best in the region，屬於教育部。第二個獨立研究所，就是我們東亞所的前身—IEAP(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在 1973 年成立，李光耀與吳慶瑞認為，面對西化的 value system 看到日本與台灣在推動儒家文化的教育，確定儒家文化有 positive 的部分，儒家文化對經濟發展是正面的。四小龍成功是靠 human resources。新加坡與日本台灣香港比起來，除了經濟方面，新加坡社會也太洋化，因為新加坡的電視媒體與報紙都用英語，是 direct exposure 在西方文化中，受到西方價值觀衝擊超過日本與港台。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y 是 EAI 的前身，不算政府機構，是吳慶瑞接受港商捐三百萬新幣做種子基金。我在杜維明在哈佛出版的書有一章講到 IEAP 的興衰，1990 年 IEAP 就改成 IEAP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這樣名字與 IEAP 很接近，我們從一九九零年開始，工作方向就改為 China Watching。關於研究方向改弦易轍，官方提出的理由是新加坡是小國，儒家思想很深遠，要留給中國這個大國的學者來做；但實際的理由是，要把儒家文



化引進教育學程，引起很多人反對。中國人讀儒家，結果印度、回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都要一起來，政府怕宗教衝突，而且很多新加坡學生根本不太看中文，儒家思想太深。終於改為研究現代中國問題的非官方原因則是，一九八六年，吳慶瑞退休，擔任中國國務院的 advisor，Exposed to China Studies，看了西方的中國研究，覺得沒有用，新加坡要自己做，非西方、非中國，研究立場中立一點從東南亞、從新加坡的角度來看中國問題。很多大陸學者來，我跟他們講，大陸的包袱不要了，美國的包袱不要了，只要把美國的方法學留下來。

第三所獨立研究機構，是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專門研究新加坡自己的問題，由吳作棟建立。IEAP 本來是 privately, constituted, publicly institution, 這是新加坡特殊的制度，所以兩個前副總理都有 one dollar share, 一個是吳慶瑞，一個是王鼎昌。所裡名義上董事長是吳慶瑞本人，王鼎昌是 vice chairman 它們兩個都有 one dollar share，王後來當總統。

除了這些研究所之外，新加坡還有一個獨立機構，是一九九六年成立的 IDSS (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 是由美國返回的大使 S.R. Nathan (現任總統) 擔任主任，屬於國防部。這些研究機構之中，只有東南亞研究所是直接官方單位，其他都靠 endowment, foundation, project 支持其運作。……我認為由大學來做這些研究不行。教授是全職教書。如果將研究所設在大學裡，一方面，too much politics，你屬於經濟系，我屬於社會系，大學要給一筆錢，每天吵來吵去。此外，大學裡容不下政策性研究，很美國化，研究要升級很難。

1990 年我在國大經濟系那時，吳慶瑞已經不擔任副總理，但是他影響仍很大，仍擔任中央銀行副總裁。他叫我去，說要研究 social science based 中國，不是王賡武的歷史文化這種。新加坡很怕他；新加坡人一共怕兩個人，李光耀與吳慶瑞，吳慶瑞管全部的官員，非常嚴格，他和我說，他瞭解我的背景，要我去接 IEAPE。他說 "We are not part of university, you have to resign. I will give you 5 year contract renewable." 我當時才五十歲，很多人叫我別去，說吳慶瑞很難相處，failure rate 超過百分之五十。我認為我可以做研究，後來我發現吳慶瑞雖然很兇，要求很嚴，他也是一個學者 once you pass the test, you are safe.

早期國防部重要的官員都是 scholars 去做，三軍總司令都是 scholar，學生考試好的，送去外面留學以後回來。吳慶瑞 very sharp，不像李光耀是 politician，他不講的。九零年到九一年，吳慶瑞說一定要從大陸找學者，用 original material，這樣 interpretation 可以不同。但是那個時候大陸留學生很少，六四以後，有一部

份大陸學者來，他們瞭解中國，但是學術不行，英語不行，可是我對中國研究沒有 up to date，我要重學 China studies，但是我的 methodology 很好，從改革開始研究，一步一步，從九一年開始給政府出 policy papers。這些早期的大陸學者。

我們在一九九一年一月開始出 China news analysis,另外出 discussion paper 屬於 internal studies,當時基本上只有兩個人能寫英文報告。新加坡早期反馬共，可以寫的一個正是的前新加坡共產黨共犯書記余柱業，；余柱業逃到印尼，後來到大陸，一九九二年返回新加坡。他是吳慶瑞的好朋友，通過吳慶瑞，李光耀同意接受他。吳慶瑞與李光耀是同學，都是大學第一級 first class honer，一起搞獨立。一九九零年余柱業在湖南教英文，我問他，為什麼在湖南？後來才知道，因為馬共的電台在湖南。余柱業在一九九五年過世，他是廣東新會縣人，很聰明，寫了很多關於大陸內部的 paper。

我們聘請人，要透過安全部先 clear。吳慶瑞在中國很多年，有很多關係，我是外行，他介紹過來許多人，沒有 passport，一下地就安排 PR。

一九九六年，IEAPE 改組，我們請不到學者，吳慶瑞身體不佳，王賡武從港大退休，來接任 chair，吳慶瑞改任。王賡武認為 Think tank 必須與學術機構掛鉤，不然人家不願意來。think tank 裡研究人員 autonomous, you think and you ask。吳慶瑞很嚴格，他要什麼東西，秘書打電話來，馬上就要。有一位學者研究非常好，但是不寫東西，我的長處是 write very well。吳慶瑞對大陸學者很好，對新加坡人很嚴，我是學者，他也是學者，所以我們相處還好，他看東西很快，英語非常好，做過很多部長。包括汪辜會談時，我們負責招待，大陸經濟局、還有其他人來找吳慶瑞，很多。我們研究報告不太公開，圖書館也不公開。

1997 年改叫 EAI, 就不叫 chairman, 叫 director, 我與王賡武平行, 我做 research director 中文叫主任, 王賡武英文的 director 中文可以說是學術所長, 但中文不重要, 英文才重要。中國變得很快, 九二南巡以後, 我們 93 到 94 年搞蘇州計畫, 我們也開放, 請大陸在英美拿 Ph.D 的人來, 但因為我們不屬於大學, 很難請人。95 年以後, 吳慶瑞身體不好很少上班, 他告訴我 you'd better get back to university。EAI 由吳慶瑞負責募了五千到六千萬基金做基礎, 現在 EAI 重新開始, 因 IEAPE 是法人, 要申請結束。

王賡武與我非常互補, 他的國際聲望高, 提高 EAI 的名聲, 也讓 EAI 較對外界開放。過去不鼓勵發表, 早期寫的研究室給政府看的, 不能公開, 現在鼓勵出版, 而且屬於大學, 除了 policy research 還寫 academic papers, 鄭永年是我手

下最成功的學者。鄭永年離開，賴弘毅也離開，英國來挖我的人，我們所裡成為英國的培訓所。我跟王賡武 argue，他接受我的看法，繼續注重 policy studies，但是 scholarship 是很重要的 base。Policy papers 要有 executive summary，10 到 12 頁一篇文章，部長花 3 到 5 分鐘看 summary；如果有興趣，會再花 5 到 10 分鐘深入。吳慶瑞不太管 scholarship。如果採美國的學術研究方式，也有問題，是 argument for argument sake，有很多 hypothesis 對 policy study 很不對。eventually, we want all scholars to write policy。policy papers 內容不是很深入，是很一般性的，informative。另外一種是 reactive，一定要快，最好第二天就出來，原則是 accuracy，up to date，concise informative，像經濟分析每三個月一定要更新，1995 年寫的，現在變化很快，已經是 different animal，big theory 對教書很有用。

訂題目就是我給他們訂。我已經做了二十年，每天看人民日報，有一次李光耀秘書打電話來問事情，我馬上就查，叫大家全部不要吃中飯，兩小時內找到。他問「鄧小平有沒有說過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後來，很多學院來的學者，他們沒有 overview 或是 big picture，學校裡教書的人都 very narrow，但我希望鄭永年可以接我，他跟著我做了十一年，我已經太累，做了十多年。我叫楊大利來申請，國大非常喜歡他，因為他是芝加哥大學。鄭永年來可以與他配合。每個月我們交三份報告，到政府裡做 briefing，政府認為我們對政府貢獻最多，李光耀看完我們的 paper，比如說與台灣有關，他會問作者的背景。研究所不給 tenure，三到五年的 contract 是 renewable，現在只有鄭永年有 tenure。

我們的研究路線一定要是中國國內問題。國際關係我們不太重視，像中美關係，大家看法不同，不需要做；也不做戰略性研究，國防部自己有人做。我們做的東西對大陸沒用，對台灣也沒用，因為沒有 recommendations。新加坡政府部長太忙，他們沒時間看，所以需要 informative，我們的重點是中國內部 economic 或 social development，而且要 big picture。現在有 full time staff，大約十二個，年輕的 P.H.D.，不一定會寫東西，但我們不寫不行，所以就先給他 visiting，可以寫，就再 renew contract，stay for two years。我們希望每年寫三到四篇報告，我們可以用 short term visit。美國學者可以來度假，write one paper，give one seminar，付他五千美金。

為什麼李光耀重視中國，一部份是因為中國崛起，也是因為新加坡的 strategic position。外國元首訪問新加坡不會問新加坡的事，一開口就會問中國的

事，因為我們 friendly neutral，代表中立的觀點，它們不會去香港或台灣，因為在台灣你什麼黨就知道你會說什麼話。

我們不斷在 recruit, recruitment is an ongoing process，所以與大學不同，大學有暑假，我們只有三到四個禮拜假期，新加坡政府我們研究大項目：香港民主化。還有一個大 project，就是蘇州工業園區評估，但研究報告不可以出版。我們所與大陸有各種聯繫，像統計局、社科院、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辦公室，我們原來只與中國 think tank 聯繫，最近也與大學接觸，過去大陸大學不太做研究，現在有年輕人有學術水平可以做研究，我們的 policy papers must have something to say、readable，不可無病呻吟。美國學術界常常寫一樣的東西，用不一樣的 title 或概念，注重包裝出版，substance 不重要。中國學者不會包裝，所以不能在美國出版。

我們開學術會議就一定要出版，就是為了大學，現在 EAI 是大學的一部份，我們有 visiting appointment 與 regular appointment。大陸來的都用 visiting，英國與美國的 PHD 就用 regular 因為他們有 social methodology 與英語。

### ◎王廣武的學思歷程（以下第一人稱）

我的家庭很小，沒有兄弟姊妹，只有父母親。我父母親生長在中國，長大之後才出來，我父親是大學畢業之後才出來的，是來辦教育的。父親先出來，後來他做得蠻好的，人家找他做中學校長，所以他就到爪哇去。未去之前，家裡的人就要他成家，他就回去就娶了我母親。非常傳統，家裡已經說好了，他就娶了我母親，就帶到爪哇去。所以我出生在爪哇。(父親在)爪哇也沒呆多久，我是在 1930 年出生的，大家都知道的，那時全世界經濟不景氣，非常嚴重，爪哇受的影響是特別的嚴重，因為爪哇是靠甘蔗及蔗糖的生意。當時可能全世界的蔗糖完全不值錢，一點都不值錢，沒有價值，擺在那裡沒有用，結果被丟到海裡去。當時的荷屬東印度受影響特別大，華校都是私人辦的，是靠華僑商人辦的，沒有錢就很難辦得起來，沒什麼辦法，因為沒有學校經費，老師的薪水都欠著，沒有辦法付。總之環境不允許，他就沒有辦法留下來，想回國了。但也回不成，因為校方沒有錢給他買船票回去，沒錢，真的沒錢！經濟不景氣是很嚴重的，全世界都如此，荷屬東印度受影響特別大。後來勉強他籌足到新加坡的船票，因為回中國不夠錢，他之前在馬來亞呆過，(新加坡)朋友介紹到霹靂州去，有份工作是做副督學官，是到怡保去的。(我)是在怡保長大的。我為什麼這麼說呢，換句話說，他們是純粹的華僑，僑居在外，遲早要回中國的，而且寧願早，也不願遲，所以一直想回去，就是想工作，省一點錢，就回中國去。那麼工作沒幾年，他就準備回去了。家裡的人就說，中日要打仗。那時是 1936 年吧，中日要打仗，那麼家裡的人說，或許你在外面對家裡好點。日本打下來之後，怎麼辦？他父親就跟他說，你回來看看，但是工作還在外面。嗯.....所以他就回去看看家，那是我第一次回國，我那時已經有 6 歲，帶我去看看，祖父祖母都看到了。請假幾個月，就回來了。回來之後不多久，就“七、七”、“八、一三”、“盧溝橋”，“七、七”盧溝橋事件，1937 年抗戰(開始)。(由於)抗戰，不能回去，在外面儘量寄錢回家，幫助家裡人。沒想到 1941 年日本也打到這裡來了。

打到新馬來。那麼就在日本佔領(新馬)之後，他就呆下去，一直等。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有機會再回去。1945 年日本(被)打敗之後，他就準備回去，想回去。沒有錢，沒有薪水嘛。所以還得工作一段時間，好在因為他當時工作的是州政府式的，是馬來國王的那個霹靂州，霹靂州是英國政府管的，就象英國的保護國。所以英國回來之後，就對以前的公務員補貼一點戰爭時期的錢，就是(你們在)戰爭時期，如果沒有做什麼壞事情，就補貼你們，但是要等。那麼同時他

也想到，不如等我中學畢業之後一起回去。所以我這麼講，你說家庭教育，我從小起（被）灌輸的就是要回國的，國家是在中國，不在外國，所以對當地的情況，我父母親都不跟我講，談就談中國，家裡談的都是有關中國人，母親談談家裡的事情，談談王家的事情，她是姓丁的，丁家的事情，王家的事情，從小就是講這些東西。讀書是另外一回事。很小的時候，（我）學字是媽媽管，稍微大一些會看書，我也上過學的。我上午上英校，下午上華校，常常如此，也不是正式的華校，是下午班教孩子中文的。那麼頭幾年就如此……，抗戰時反而好。我本來先上華校，但學校被日本人佔領（之後），華校越來越多用日文。父親不甘願就把我抽出來，（我）就不上學，三年沒上學。他來教（我）。父親教孩子是不大行的，他就找了一些他朋友的孩子，大家一起來中文教育，所以抗戰時期反而好，因為在那時期我中文學得多一點。不然的話，我學的是在英校，你想，家裡講中文，下文班學校學中文，那麼上華校（明德學校？）讀的差不多一年，後來因為日文用得越來越多，我父親就把我抽出去，不再念了。三年裡中文學的比較多一點，沒有上英校，那是不上學嘛，根本不上學。等抗戰完之後，日本人投降了，英校也恢復了，（我）回到學校去念中學，結果蠻順利的。因為我們年紀大了，三年多沒念書了，儘快讓我們升班，我英語蠻好的，因為英語好，別的東西就比較容易點，所以很快地升班。到1946年就中學畢業班，英校是11年制，不是12年制，是6年小學5年中學，而中國是12年制，6年小學6年中學。

我父母親不是等我中學畢業之後我們一起回去嘛。所以等我中學畢業時候，我是1946年底考中學，1947年3月中學畢業了，有個文憑，他就帶我回去，回到南京考大學，考他的大學。他的大學是東南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我就考他的大學。

我父親是國民黨以前畢業的，那時叫東南大學，國民黨上臺不是1928年嗎？1928年（國民黨）打下南京（之後），國民黨政府成立的時候，把東南大學的名字該為中央大學，因為南京是首都。那麼我就考進去了。一年多，（南京）被解放掉了，解放軍打到長江，我父親回馬來亞，為什麼我父母親又回到馬來亞呢？本來父母親不願回去，（但）他們又回去了。（1947年）他回去（中國）時。家裡窮得不得了。抗戰多少年！而且內戰多少年！所以他在南京就教中學。南京的冬天是冷的不得了，而且根本不生火的。他在外面本來身體就不太好，在熱帶住了20多年之後，回去吃不消。教學又很辛苦，結果他病倒了。病到什麼程度？我可以舉個例子。我在大學念書，他在中大輔中教書，但我離他不太遠，我們一

年級學生離開他的中學不大遠，結果他病倒之後，連改卷都無法改，叫我回去幫他改卷子，我幫他改，他沒辦法，他起床都不能起床。所以我母親覺得這個冬天過得太危險，不理想，他身體實在不大好，決定待不下去了，(而且)國家又那麼亂，南京政府等於.....經濟根本垮掉了。錢都不值錢了，舉個例子，錢一大包一大包，數都不必數，稱一下就行。物價膨脹的程度簡直就不可想像，所以拿薪水也沒有用，沒用的。他還是靠他帶回去的錢，(因為)薪水不夠用，每個教師都是幾份工作的，不然不夠生活的，像大學教授都是到會館、中學教書，多拿幾個薪水才夠用，而且天天在變，膨脹到那個程度，所以我母親也(覺得)吃力一點，覺得留不下去。那麼就問，還可以回來(馬來亞)嗎？他辭職離開那裡，我們全部搬家，全部搬回去(中國)了。

我記得我在怡保臨走的時候，跟我的中學同學說 byebye，再見了，說以後有機會再見，不再回來的，都說好的。結果沒辦法，好在繼承他的那個人(事情)辦得不好，很糟，所以當地政府就說既然你願意回來，還是叫你回來，把那個人換掉了，其實是不要他了。就叫我爸爸回去了，所以(我父親憑)這個機會，他離開(南京)了，不然沒有這個機會(回馬來亞)。他沒有工作，也沒有這個可能回去了。他有工作，他就可以回去馬來亞，所以就這樣過去了。

他願意回去，看有什麼事情好做。他那邊的人打聽到政府不滿意他的繼承人，政府認為既然你願意回來，那就回來吧，就這樣，(政府)就叫他回來了。所以他就先回去了，我是在1947年3月離開馬來亞回去(南京)，6月考試，8月揭曉，9月底上課。過了那個冬天，第二年的3月，過了那個冬天，簡直危險得不得了，二三月份，我父母決定沒辦法再撐下去。因為當時這邊的馬來亞的朋友們打聽之後，說可以再回去工作，他大概在三、四月份就離開了。我是留在那邊(指南京)繼續念書，無所謂，繼續念書，一年級就讀完了。暑假回家就跟我的叔叔他們住在上海，也在南京學校住。那麼9月底10月又開學了，但那個時候淮海戰役、東三省已經(被)共產黨打下了，瀋陽已經撤退了，北京已經被包圍了，天津也差不多了。淮海開始打了，部分的解放軍部隊差不多到浦口了，就是南京外面了.....基本上這些左派人士在報上刊登，說解放軍差不多到了長江。我父母親就非常急了。11月底，開學一兩個星期吧，(或者)大概不到一、兩個月，我記得不大清楚，學校宣佈解散了，叫所有的人回家去，老師也走了。很多東西被搬走了，回家的搬走了，留下的大概是我們三、四十個無家可歸的人在學校。學校對我們很好，有的吃，天天有的吃，也沒有書念，學校基本上沒有人了。

就我們幾十個無家可歸的學生，離家太遠了。四川、貴州、雲南回不去（的學生）留在那（學校）。大約過了一個月，就在等著……。那麼，總之，沒有開學的希望。一方面沒書念，另一方面可能打（仗），滿街都是兵了。你看所退下來的兵……。雖然那時蔣介石已經辭掉（總統職位）了，回到他老家去了，李宗仁副總統那時預備守著，同時也在和談。（其實）也沒有好談的，（因為國民黨）沒有牌子可以打了，（大笑）但是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我們普通人不知道。所以我父母覺得，你書沒得念，留著幹什麼？留下來等著幹什麼？等到南京打的話，你怎麼辦？主要的理由是我沒有兄弟姊妹，父母找我叔叔，（兩個）叔叔跟我談談，（說）你沒有兄弟姊妹，父母叫你回去，你怎麼能不回去呢？（大笑）我是沒有意識（這一點），我是離開（馬來亞）了，還回去（馬來亞）幹什麼呢？

我要留在中國。因為我父母是逼不得已再回去（馬來亞）的，身體吃不消了，也沒有錢，所以才出去。我是學生，學校照顧得很好，我願意留，沒有問題的，（因為）學校天天有的吃。我沒有意識回去（馬來亞），我也不知道（南京）怎麼打法，南京打不打、守不守，我也不清楚。那時我才 17 歲嘛，懂什麼，不大懂。……我回去考的時候，才 16 歲多，大概我臨走的時候，已經 18 歲了，過了一年，17 歲考進去，開學的那年我是剛 17 歲，讀了一年，再開學的那一年是 18 歲。頭一、兩個月，學校就解散了。我本來就對政治不大瞭解，我是搞獨立文學的，搞文字的。我父母親也不大（談政治的）。母親比較談（政治）、她比較喜歡注意政治，我父親不談政治，所以我對政治是很幼稚的。我到現在還是很幼稚，而且更幼稚了。所以中國男人——政治那麼複雜，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第三黨的，...學生之間複雜的不得了，他們（學生）很清楚的，在國內長大的，他們對政治敏感的很，政治敏感比我強得多，我是基本上不大懂的，海外華人。

整個經濟垮掉了，不能不理會，一定要理會，理會也理會不懂。懂是另外一回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將來怎麼樣，不懂。所以後來叔叔就把我勸回去，我就回去。兩個叔叔很好，儘量把我從南京搞到上海去，所以那個情況，其實是逃難的情況，到上海去買船票，送我到新加坡去。回到新加坡剛好是耶誕節以後。1948 年那年底到家的。沒想到沒多久（南京）解放掉了。我當時就明白，可能我父母親也知道沒有再回去（中國）的希望，他們年紀大了，比較大了，……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家裡的人基本上還要靠他們在外面幫助的，又是回到以前的狀況，不知道，至少是不知道，所以我回去的那個時候，我剛大學一年讀了一點，將來怎麼辦？好在我有個中學畢業證書（笑），是當地的中學畢業的，至少有資



格申請在馬來亞念書，剛巧就在這個地方。剛剛要建。(當時的)馬來亞沒有大學，只有兩個學院，一個叫萊佛士學院，一個叫醫學院，馬來亞政府剛好 1948 年在考慮怎麼樣把這兩個學院合併，還是不要合併，他們還未做最後的決定。1949 年年初他們有個審查團，是英國派來的，一個很有名的學者帶著這個審查團，他們到世界英屬各地去考慮辦大學。1949 年大概年底的時候寫報告，報告說把這兩個學院合併為馬來亞大學。他們的意思很清楚。英國人蠻聰明的，有計劃的。意思是他們準備要退，他們的帝國完蛋了嘛，二戰之後他們沒有這個力量，撐不下去了，印度在 1947 年就退出來，(他們)在緬甸被趕走，他們在馬來亞能留多久？無法留多久！他們是儘量地能留就留，準備蓋大學的理由(是)準備以大學的方法就是培訓一批人接班，不然他們走了之後，就亂了。這是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又是馬來人，又是印度人，又是華人。上面有個英國人在，大家還可以勉強生活在一塊，英國人走了，怎麼辦，誰來幹？如果馬來人來幹的話，中國人接受不接受？若中國人來幹，馬來人絕對不接受。這是馬來人的世界，是非常複雜的情況。一來他們沒有打算，他們基本上是商業利國的國家，他們要做生意的，他們本來就是……他們所謂的帝國主義是什麼？帝國主義是由資本主義演變出來的，要做大生意，要做全世界全球化的生意，英國人是靠這點的，他們有支海軍來支持它的商業，所以他們計畫如何能夠保持一種影響，那麼就用大學這種方法來培訓一批繼承它的人，交代給他們來做，讓你們來做，但是(他們和繼承人之間)是朋友，是有關係的，由你們(繼承人)來做。這是一種方法，是一種制天下的方法，所以他們就把大學建立起來。為什麼他們要在臨走的時候要辦大學呢？其實是很有道理，其實他們很聰明的，英國人很務實，他們是有想法的，不是隨便走了就算了，不是不負責任；同時也考慮到他們自己將來怎麼樣還能繼續在這兒活動，繼續在這裡做生意，很聰明的。所以它(採取)這個方法就是(因為)這個道理。本來萊佛士學院很小，是個小師範學院。它就把那個師範學院同醫學院結合起來成為馬來亞大學，剛好決定如此。那麼我呢？我有個中學文憑，有資格申請，但同時我的問題是我的國籍是中國國籍。(怎麼辦？)但我從小的時候在馬來亞，到臨走的時候，我住那麼多年。(當時規定)你要住若干年之後，才可以申請成為公民。你有了公民權，才可以上馬來亞大學。我的中國國籍就有問題了。它會不會讓我上，不清楚！不過總之你有公民權就可以申請。我剛好(在馬來亞)14 年，我是 2 歲的時候來的，走的時候是 16 歲，剛好 14 年，它的標準是 14 年就有資格申請當聯邦公民，我的印象是如此。我父親打聽一下，好，

既然如此，他也希望我能夠上大學，你上大學已經一年多了，失學又一年多了，找份工作做，你只有中學文憑，所以他就幫我申請公民，因為我有權（利申請公民）。所以我就申請（公民權），那時我父母親沒有申請，我申請了。

主權還是馬來國國王的，但屬英國的保護國。因此，也屬於大英帝國之內的一個保護國。所以這個保護國的權利不能算是個國家，我又不出生在那，所以沒有一個原來的公民權。所以馬來國王也不會承認我，因為我不是國王的 subject/臣民，不是馬來國王的臣民，又不是英國國籍，因為我不出生在英國領土，沒有資格持有英國國籍。當時馬來亞還沒有成為國家。馬來亞之後建立馬來聯邦，但馬來聯邦沒有獨立，還是英國的一個保護國。在那種情況之下，公民權並不是國籍。後來馬來亞獨立後的時候，經過各方面黨派討論很久之後，馬來政黨也就承認了這個公民權，就改成、等於馬來亞國籍。其實，到現在為止，還有點不清楚。到現在為止，馬來人還自認為只有馬來人才是真正的國籍，其他就是公民權而已。公民權與國籍在國際法裡頭有分別的，

它形式上表示我們是一種自然的主權，你們是世界裡的，讓你做公民，其他是真正的本地人，土著、原居民。他們有他們的特權。所以到現在馬來人還不肯放這點，他們要保護他們的特權。當時還不怎麼複雜，就說有公民權。有了公民權，你申請就比較順利一點，沒有什麼爭論。（有公民權，）大家也馬馬虎虎。當時情況很亂的。這裡頭也在打，緊急法令時期，馬共與英國政府跟馬來貴族，所謂馬來民族黨派，都是相對的。互相殘殺很厲害，華人被殺的很多，情況是非常亂的。大家也馬馬虎虎，不怎麼嚴格，（既然這）是2歲到16歲的事情，就算了。所以（我的）護照是中國的護照，那麼我就成了馬來亞公民。是馬來聯邦的公民，是英國保護的市民 protected person。那麼我就進大學。就在這個地方，正式開學典禮的時候，我還是學生，一年級學生。算是第一屆。不過，其他還有學生，本來還有兩所學院的學生，他們也算。我算是第一屆純粹的馬來亞大學的學生，就這麼回事。但我又從一年級學起了，中國一年多的完全不算。所以我過去的教育背景來講，就比較複雜。中學是上英校，即正式的學校是英校，華語、華文、中國字，這些都是家裡學的，學校基本上不教，只有（在）小學裡學點，完全靠父母，尤其是父親，古文完全靠的是父親教的，他是老一代的，四書五經念起的。他英文也很好，所以中英文都好，因為他工作的是用英文，但負責的是華校，所以他中英文都好。家裡的大部分書是中文書，不過他懂英文，他也喜歡英

國文學，他愛文學，所以我從小就跟他學文學的東西，對歷史是間接地學到一點，基本上看到的是文字及文學方面，還有精選、四書五經、文學，中國傳統的教育是如此，就是先把文字搞好再說，其他的慢慢來。你文字搞好再自己看。我父親的出發點就是先把你的文字搞好，能看，能寫，至於你以後會學什麼由你去。他沒有叫我學歷史，也沒有叫我學文學；以文為基礎，打好基礎再說。所以大學的時候，我考的是文科，我不怎麼喜歡理科，數學不怎麼好。當時也沒有重視。中學時候科學教育很簡單，也沒什麼把握，興趣也不太濃，那麼不如考文科。當時的文科制度是這樣的：先讀三年三種課，第四年再專業一點，三年後再去選，其實沒什麼好選的。學校很小，學生很少，一共幾百個學生。像我們 1949 年考進去的一共 100 個學生，文科大約 60 個，理科大概 40 個，理科更受限制，因為理科要靠儀器、實驗室之類的，學校太小，還沒有蓋好，所以就只能收 40 個學生一年級的理科學生，文科的可以多收點，大概 60 多個。他們不要收太多，因為不知道出來幹什麼，出了（畢業）之後（沒有工作，怎麼辦？），他們態度基本如此。英國人很聰明的，如果你大學教育出來以後沒有工作，就會搗亂（大笑）。它不贊成，它不是以教育為教育的，而是培訓一批人去支援他們，幫他們，這是基本態度。學校很小，我們能選的課很簡單，從歷史、英國文學、地理及經濟學四門課選三個，我選的是歷史、（英國）文學、及經濟，讀三年，樣樣都要念。三年之後，看你考的怎麼樣。要念第四年的話，看你考的怎麼樣。好在我三科都還可以，我第四年再選歷史，選歷史的理由太複雜，也不是因為我特別喜歡歷史，當時還沒有，都喜歡。經濟可以，文學也還可以，我很喜歡文學，我到現在還是喜歡文學。

我裡頭（指訪談者帶去的劉宏教授編的《坦蕩人生學者情懷：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有講過的，在李元謹（訪談）那裡頭講過的。基本上是那個經濟教授我覺得他太...假得很，他教學教得不好，我對他一點興趣都沒有；其他有些老師還好。那個教授，我覺得沒意思。文學的教授我很喜歡，（但）他走了，最後那年他到劍橋大學去當教授了（笑），他離開了。他留下的幾個手下，我不怎麼欣賞。既然他走了，我的興趣就降低了。那時剛好那個歷史教授特別有意思，是很巧。

我選了歷史。那就有意思了，我漸漸對歷史感興趣了。.....我（之前）為什麼不對歷史感興趣呢？因為我中學時代讀的歷史都是英國歷史，是大英帝國的歷史，一點興趣都沒有，又枯燥，又與我無關，我要回中國去嘛，讀它幹什麼用呢，

一點興趣都沒有，所以根本不念，差不多考不及格了（笑）。到大學讀的歷史有趣一點，因為大學的歷史教是世界史，加上東西關係。談到西方歷史的話，也是西方的歷史怎麼到亞洲來、西方帝國在亞洲怎麼建、亞洲人的反映、亞洲人的社會、政治、文化，以及亞洲的這些國家怎麼對付這些西方侵略者，這些東西他們都談，那就比較客觀點。大學的所有的老師都很客觀地討論，並不是做宣傳的。中學的則不同，象中國也是這樣，中學是一味灌輸的。

它開放了嘛。讓你自己看（書）、討論去，而且討論時跟老師討論，沒有偏見的，大家可以公開地討論，老師都很好。歷史系的老師蠻年輕的，教學的比較老一點，還有另外兩個比較老，中間兩個新的老師，剛從劍橋畢業，正在寫他們的博士論文，非常聰明，學得很好、很能幹的，都是劍橋的高材生，請他們來教。他們年紀比我們大不了多少，都是二十多歲的人，他們大學剛畢業，大概二十五六七歲，我們也不過十幾二十歲，相差沒幾歲，談起來很有意思。都是年輕人，大家一塊討論，不同的意見都談。當時我們這邊學生也是一方面反殖民主義，總希望英國人早走好，他們都知道的；而且左傾的學生很多，親馬共的，同情馬共的，反對封建的，反對殖民的，很多；同學之間也有支持他們的，也有反對他們的，各有不同的意見。老師們都很公平的，大家（的意見）都聽，這一點很好，他們不做宣傳。我對西方的史學比較尊敬就是這個原因，它並不宣傳。中學則不同，中學我是有反感的，大學呢？可以說的是大開門戶，什麼都可以講，什麼都可以瞭解，什麼書都可以看，圖書館裡什麼書都有。那麼這樣一來我就決定讀歷史。讀歷史之後讀了一年，就決定再做下去，讀碩士。碩士學完，就去考博士，考了一個獎學金，到英國的倫敦大學去讀博士。